

历史 外论摘编

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权与社会的政治共适应

[俄] 安·萨温 [德] 维·焦宁格豪斯 陈晓棠 译

【中图分类号】K51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 (2017) 04-0034-0006

苏联时期各阶层和群体的生存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也向社会提出适应新政治环境的尖锐问题。结果,民众形成一系列独特的适应策略,并在整个苏联时期不同程度地顺利加以运用。

一、“弱者的武器”:生存策略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社会各阶层以积极适应方式进入现有政治体系、新社会结构和精英阶层。接受社会主义价值观占主导,首先指的是入党、入团和参加工会。不论真心还是假意融入体制,类似行为都是职业升迁、获取较高劳动报酬、享受各种优惠和特权的必要条件。消极的适应方式则更加多样化、更加灵活,主要包括试图迁移到更有利的社会环境(各类移民)和偏离行为。例如,在大规模集体化、没收富农生产手段和土地条件下,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弱者的武器”^①可以是农村逃离到城市,对集体农庄成员而言则是政治上看风使舵,首先由于实行所谓的“自我没收生产手段和土地”

政策,他们有意地改变(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分家和重新分配传统社会角色。农民同样逐渐形成一系列能够减轻赋税压力的行为策略。快速发展宅旁园地经济、外出打短工、经常逃避劳动、缺少首创精神、马虎懒惰、小额偷盗集体农庄财物是农民适应新环境的常见方法。与农民一样,工人战前疲于应对长期经济短缺和剥削性突击劳动制度条件下的个人生存问题。他们经常表示不愿接受新的劳动纪律,还有一些表现为干部大量流动、酗酒和“磨洋工”。同时,工人感到自己是为社会主义和劳动人民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先锋队,工人阶级与斯大林专制制度之间由此甚至实现某种“和谐”,这也是不存在大规模工人抗议活动的原因。

伟大卫国战争时期,政府颁布刑法和行政法新规定,以往的主要适应性实践失效。在刑事处罚的威胁下,工人不能为寻找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报酬自由离开企业,迟到、旷工及其他违反劳动纪律

^① 詹姆斯·斯科特语。

【作者简介】安·萨温(Андрей Савин),历史学副博士,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历史研究所社会政治发展历史研究室副研究员;维·焦宁格豪斯(Виктор Дёнингаус),历史学博士,阿尔伯特—路德维希—弗莱堡大学东欧史教研室教授(德国弗莱堡市),东北欧德国人历史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德国吕讷堡市)。

【译者简介】陈晓棠,法学博士,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莫斯科德国历史研究所与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合作出版列·伊·勃列日涅夫工作日志项目成果。

的行为被视为严重犯罪,会受到相应惩处。农村税负压力加大,开始严格限制集体农庄成员的行动自由,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适应性实践大多已不适用。例如,政府清楚宅旁园地对集体农庄成员生存的重要性,因此规定,凡具备劳动能力的成员,如不能完成最低劳动日定额,政府有权剥夺其宅旁园地。非常时期,真诚地希望自己为早日战胜敌人做出贡献成为农民履行义务的主要积极动因。

尽管害怕在战场上被打死或受伤,担忧孩子和亲人的命运,日常生活的艰难以及不认同斯大林主义国家的战前政策,但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大多数居民与政权的根本利益总体上是吻合的,从而极大消除了20世纪20—30年代特有的政治适应的冲突性。爱国主义宣传和调整宗教政策令民众对战后改革充满期待,这成为社会有效的精神心理缓冲器。到斯大林执政后期,国家很大程度上再次复制20世纪30年代末形成的政权与社会的关系模式,虽然大清洗已经不如战前频繁和残酷。为战争胜利付出高昂代价的民众没有等来期望的结果:集体农庄体制依然稳固,城市物资依然持续短缺,生活艰辛。应当承认,20世纪30年代农民采用的适应策略在战后衰败、男性缺乏、极端贫困和深陷危机的集体农庄面前效用下降,导致农民继续流向城市。

二、“解冻”:波浪式适应

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分为两个特征鲜明的阶段,相应地,民众对政治制度的适应类型也分为两种。第一阶段(1953年至50年代末)可称为平衡型适应,即政权与社会之间建立起某种平衡,两者相互容忍对方的价值观体系和行为范式。斯大林的继任者在其去世后立即实施重大改革。1953年春夏之交,苏联开始调整劳改制度,有选择地平反被监禁人员,直至大规模释放囚犯和废除古拉格^①制度。1953年废除特殊居民点(流放农民)制度,1955—1956年停止种族流放。减轻农民税负、提高农产品采购价格、削减重工业和军工综合体投资等措施立即对民众生活产生积极影响。停止“大清洗”明显改变了政治制度的性质,使其更具预测性,更有利于改革。政府因此迅速赢得了民众一定的信任。

民众的政治适应具有波浪式特点。赫鲁晓夫执政初期,积极的适应策略占优势,然而第二阶段,即“光荣的十年”(50年代末至1964年)期间,由于赫鲁晓夫推行垦荒运动和人均肉、奶、油产量赶超美国的“宏伟”计划,农业领域启动新一轮强制措施。民众尤其难以接受旨在消除农民生活小资产阶级残余的扩大集体农庄运动,强加给集体农庄的高额生产和采购任务,以及压缩个人副业规模。结果,消极的政治适应重新占据首位,导致农民分化加剧,农业人口更多地流向城市。对政权的积极适应机制停滞,民众抗议行动增加。国家宗教政策是政府与社会丧失对话机会的指示器。始于1958年底的反宗教运动导致大量教堂被关闭,教区遭到清除。

三、“他们装作付我们工钱,而我们也装样子干活儿”

所谓的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1964—1982年)很大程度上应视为政权与社会长期相互适应的结果。詹姆斯·米勒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形成的政治体制与民众的相互适应方式称为“小交易”,即国家向民众提供社会安全保障和一定水平的福利,对集体农庄成员的个体经济、“灰色经济”和低劳动生产率采取宽容态度^②。苏联人非常形象地描述“小交易”的一个主要条件:“他们装作付我们工钱,而我们也装样子干活儿。”民众表现出自己对政权的忠诚,不公开质疑官方规则 and 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绝大多数苏联居民适应国家制度的障碍。

应当承认,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适应过程具有双重性和相向性特点。民众和政权的共适应基于“相向而行”得以实现——政权事实上放弃政治大清洗和超经济的强制劳动,主要依靠意识形态和道德激励,民众则尽可能接受社会主义价值观和理想。因此,两种相互补充的适应类型占上风:适应(民众承认和接受政权的主要价值观体系,相互让步)和同化(民众心理重新定位,根据现实环境转换旧观念、价值取向和社会定势)。

^① 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译者注

^② Millar 1985. pp. 697-698.

四、“素食时代”：政治镇压统计

毋庸置疑，“小交易”最重要的条件是停止政治大清洗。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秘密警察的活动指数最低。赫鲁晓夫时期（1956—1965年）年均575人因反苏宣传被判刑，而勃列日涅夫时期（1966—1980年）为123人^①。例如，1980年上半年，克格勃机构共追究243人的刑事责任，其中危害特别严重的国事罪59人（包括叛国罪18人），反苏活跃分子40人，走私犯和外汇黑市投机者94人^②。当然，这些统计数字不能反映政治镇压全貌。例如，一般依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142、143和227条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刑法相关条款对宗教持不同政见者判罪，而且遭到镇压的宗教持不同政见者数量可以与反苏分子相提并论。部分异端思想者依据刑法被定罪或接受强制性精神病治疗。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安全机关很大程度上以所谓的“预防措施”代替政治镇压。如果引用安娜·艾哈迈托娃的话，苏联再次迎来“素食时代”^③。停止苏联文明重要结构性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大清洗，勃列日涅夫及其领导集体非常成功地开始尝试以物质和道德激励的“蜜糖饼干”，包括建立真正的奖励体系代替惩戒的“鞭子”^④。

五、总书记工作日志

勃列日涅夫的工作日志间接反映出他努力将政治镇压降至最低。例如，1967年末的一篇日志写道：“卡巴尔达人—卡拉恰耶夫人以及其他战争期间遭流放者的奖励问题，胜利日前应当给予奖励。”^⑤1972年10月6日的工作日志明确表明总书记准备做出妥协：“如果无法废除犹太人法令，那么事实上也不能付诸实施。”勃列日涅夫这一想法有助于缓和围绕苏联犹太移民问题引发的争议，这场争议源于1972年8月3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针对犹太移民征收臭名昭著的教育税^⑥。1978年3月15日勃列日涅夫满意地写道：“取消禁止妇女随同丈夫出国的决议草案，无须对此出台专门决议。”

总书记工作日志很少提及苏联主要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以及所有与克格勃活动有关的事情^⑦。

例如，A.Д. 萨哈罗夫只被提到两次。1973年9月8日勃列日涅夫写道：“与A.H. 柯西金谈论萨哈罗夫——接不接见他。应当再次与中央委员会交换意见……需要再和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⑧商量一下是否接见萨哈罗夫。”1980年1月23日萨哈罗夫的名字再次出现在日志中：“与契尔年科通话，讨论萨哈罗夫的事。与M.A. 苏斯洛夫交谈，话题还是萨哈罗夫——真没办法。给B.B. 扎格拉金和Ю.А. 茹科夫布置了任务——迎接Ж. 沙邦·戴尔马^⑨，弄清萨哈罗夫干些什么勾当。同安德罗波夫的谈话仍然涉及萨哈罗夫。”勃列日涅夫从未提到索尔仁尼琴。因为剥夺苏联国籍问题，1978年3月16日和21日两次谈到M.Л. 罗斯特罗波维奇和Г.П. 维什涅夫斯卡娅^⑩。显然，简短的记录绝不意味着总书记欣赏持不同政见者，但这些文字是苏联全新惩罚政策和勃列日涅夫持相对自由主义立场的明证。克格勃较容易制止“世俗”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与宗教持不同政见者和民族主义者不同）发起的少量且分散的运动，其原因主要在于多数民众的认识一致。这种“一致”毫不令人奇怪，因为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排除与勃列日涅夫政权达成可接受的临时性协定的可能性。对此作家瓦西里·叶尔努明确指出：“持不同政见者是苏联化与反苏联化合作的产物。”^⑪

① См: Крамола... С. 36. 这里所谓的反苏者和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假想的和真正的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人。

② РГАН. ф. 89. оп. 51. д. 4. л. 2-3.

③ 但是苏联总体犯罪率和相关执法机构活动指数依然很高。1971年2月20日Н.А. 晓洛科夫呈送勃列日涅夫的报告显示：每年有45万—46万人被拘禁，大致相同数量的人获释；每年有2000万—2500万人受到处罚（以行政处罚为主）。1966—1970年全苏联共发生约500万起刑事案件，其中1970年就有100多万起。1969年行政违法数量1880万，1970年为2520万。苏联每百万人口杀人罪平均63起。作为对比，晓洛科夫列举了其他国家的相关数据：英国5起，美国69起。См: РГАН. ф. 80. оп. 1. д. 100. л. 21-22.

④ Подробно: Деннингхаус, Савин 2014.

⑤ Л.И. 勃列日涅夫工作日志保存在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ф. 80. оп. 1. д. 974, 975, 977-990.

⑥ См.: Деннингхаус, Савин 2013; 2013/2014.

⑦ 不过勃列日涅夫工作日志的总体特征是选择性极强，重要的事情空白。

⑧ 柯西金。——译者注

⑨ 法国政治家，戴高乐主义者，1978—1981年担任法国国民议会议长。1980年1月底沙邦·戴尔马在苏联进行正式访问，得知A.Д. 萨哈罗夫被流放到高尔基市后，他中断行程回国。

⑩ 1978年3月21日勃列日涅夫写道：“同Г. 多罗西娜、Л. М. 扎米亚京商量罗斯特罗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的问题。Ю. В. 安德罗波夫问起此事，我让他和扎米亚京同志联系。”

⑪ Еру 2007. С. 178.

(一) “……请他帮忙买个德国吹风机”

不断提高苏联人民福利水平是“小交易”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20年,斯大林去世后10年,苏联人的基本生活用品和食物依然匮乏。甚至苏联首批宇航员包括加加林的生活状况都是如此。成功完成太空飞行后,他们不仅获得政府颁发的苏联英雄金星奖章,而且获得给予自己和家人的物质奖励,包括家用电器、生活用品、短裤、袜子等。勃列日涅夫本人同样受到苏联短缺经济的困扰,他也通过当时普通苏联人非常典型的方式——“托熟人”“走后门”解决问题。勃列日涅夫一步一步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非常清楚计划经济社会各种商品的真正价值,他的工作日志中不乏此类日常生活记录:“和П.А.阿布拉西莫夫^①说过……请他帮忙买个德国吹风机。”^②“给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送去5盒糖果,给加洛奇卡^③送去一些软糖——都是桌子上现成的东西,昨天刚送来。”^④“收到肯德尔寄来的领扣。”^⑤“米哈伊尔·叶夫斯塔菲耶维奇^⑥寄来一件蓝色衬衫,小纽扣一直排到下摆,不过不是羊毛的。应该问问H.A.吉洪诺夫,4月4日他穿件什么衬衫到我们这儿来的。”^⑦“收到一件运动服,轻工制品。”^⑧“阿根廷总书记寄来一件毛皮夹克上衣。”^⑨

(二) “我本人也喜欢,例如弗洛式通心粉……”

1978年12月被授予第三枚苏联英雄金星奖章和例行的列宁勋章时,勃列日涅夫发表了重要讲话:“不久前与一位外国同志交谈时,我坦率地告诉他,我一直关心两件事——人民温饱和国家安全。”^⑩勃列日涅夫没有昧心说话,他的工作日志表明,在国民经济的各种问题中,他最关心居民的食品供应和农业发展。毫不夸张地说,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他关注苏联人民餐桌上的“盘子”,并且不是习以为常地使“盘中餐”减少一半,而是真心希望把盘子填满。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表示:“不能用土豆代替圆葱,也不能用番茄汁代替葵花籽油,苏联人民的餐桌上要应有尽有。”总书记实际上通过此举使代表大会高度重视他最关心的事业。

勃列日涅夫多次在公开讲话中谈到农业和食品话题,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

例如,1965年7月12日对列宁格勒党和政府领导发表讲话时,勃列日涅夫生动而熟练地谈起苏联家庭的饮食:“我们应该放开供应麦粳、整粒大麦米和碎大麦米,让每个家庭都能吃上豌豆米,都能用荞麦粉、白糖和蜂蜜烙饼。如果米、通心粉、面条等食品种类丰富,那么工人家庭依靠现有收支水平就能轻松满足家庭饮食需要。今天吃碎大麦米,明天吃整粒大麦米,后天吃大米。这次米价偏高,下次便宜些,这不那么令人厌烦。食物应当多样化……如果有葵花籽油、人造黄油和奶油,那么这次可以使用葵花籽油,煎熟圆葱,放入调料,完事儿。如果只有动物油,而没有植物油,主妇们就得想想怎么办。丈夫马上下班,儿子也快回来了,应该给他们做点儿吃的。”^⑪

1972年向苏联武装力量领导发表讲话时,勃列日涅夫再次详细谈到这个话题:“……即使燕麦和大麦产量高于小麦和黑麦,那么也不能给工人、集体农庄成员,特别是将军们吃大麦或燕麦。应当考虑小麦。我们偶尔喜欢吃黑面包,多数时候更愿意享用白面包。我以元帅的名义保证……任何情况下,只要我们保持乐观态度,就能够避免国内市场和居民粮食及各类食品——通心粉、挂面的供应出现波动。士兵们喜欢这些东西,我本人也喜欢,例如弗洛式通心粉。一次我到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的军舰视察,就餐时端上来的东西不知道是啥,好像是牛排。他们从哪弄来的?我问,有没有弗洛式通心粉?结果第二天才供应这种食物,而且是在被批评之后。为了保证稳定供应,我们必须坚持这一路线,我们具备相应的资源。‘怎么做’是我们的问题,民众无须了解这些。政府应该绞尽脑汁,民众

① 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

② Запись от 21 июля 1977 г.

③ Галина (加林娜) 的小名。——译者注

④ Запись от 20 марта 1979 г. 日志中提到的人是勃列日涅夫妻子和孙女加林娜·菲利波娃。

⑤ Запись от 5 ноября 1976 г. 唐纳德·肯德尔——百事可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⑥ М. Е. 莫吉列维茨——苏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⑦ Запись от 5 апреля 1976 г.

⑧ Запись от 14 сентября 1976 г.

⑨ Запись от 12 января 1977 г.

⑩ 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士兵的主要食物,18世纪由意大利传入俄国。食材通常包括通心粉、洋葱、肉馅或清蒸罐头、蒜和调料,据说由查尔斯·弗洛发明。——译者注

⑪ РГАНИ. ф. 80. оп. 1. д. 1210. л. 57.

⑫ Вестник Архива Президента... 2006. С. 33.

只要得到稳定供应即可。”^①

勃列日涅夫对青年时代的记忆有时甚至带有饮食色彩。1978年3月30日访问鄂木斯克时，他突然打断鄂木斯克州委第一书记С.И. 马尼亚金：

“请原谅，我想起当年我当土地测量员的时候，我们带着你们当地生产的焖肉罐头到田间工作。现在这个罐头厂还在吗？”惊讶的马尼亚金告诉总书记，罐头厂仍在生产，“而且产品质量比以前更好”^②。

（三）“我们乱折腾”

与勃列日涅夫的总体政策一样，其农业政策也旨在摆脱赫鲁晓夫在可预见的未来建成共产主义和赶超美国的雄心勃勃计划。由此确定反映苏共路线特征的两个因素，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第一，高度重视集体农庄成员个体经济；第二，农业的规划和领导更切合实际。关于1964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他在日志中写道：“我们乱折腾。有2—3套计划。梁赞州搞得很糟糕……畜牧业，究竟用什么做饲料？一会儿用马铃薯，一会儿用甜菜。我们今天废除威廉斯体系，明天又再次下达苜蓿种植任务。”^③但是，摒弃赫鲁晓夫政策极端方面的同时，勃列日涅夫接受了其核心内容——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首先在食品消费领域。

在“伟大事业”初期，勃列日涅夫满怀热情，对国家农业形势的估计非常清醒。在他看来，农业生产落后的原因不仅在于农业技术装备不足和农业生产化学化水平低，而且在于导致集体农庄成员劳动积极性不高的收购政策，轻视经济发展规律，计划编制、农产品价格制定和资金供给方面存在严重不足，以及通过行政命令管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结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确定五年计划的硬性任务，实行经济核算制，允许集体农庄独立规划轮种，不再人为拉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联系。通过提高主要粮食作物计划外收购价格、向农业领域投入大量资金和免除集体农庄债务，勃列日涅夫明确提出主要目标——巩固集体农庄经济状况，最终降低农产品成本。这些措施使集体农庄成员逐渐告别“二等公民”的地位。从1974年起，政府开始向集体农庄成员发放公民证，这一举措同样为提高其社会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停滞”时期的“电话管理”

然而，勃列日涅夫的热情很快被每年因循守旧

的农业运动——播种、收购粮食——所替代。勃列日涅夫时期农业运动变成常见的“争取丰收”。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没有沿着改革农业的道路走下去，而是选择了稳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体系、向农村提供补贴（的办法），每年需要从国外进口数百万吨粮食。在这种形势下，他只好亲自通过“电话管理”的方式使农业保持原状。大约从1972年起，勃列日涅夫开始系统地记录就农业问题与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区委员会、州委员会第一书记的通话内容。执政十八年间，他同党的地区精英们讨论的主要问题相同——天气条件、播种和收割进度以及民众情绪。摘录几篇典型日志：“1972年5月12日早8点。滨海边疆区—符拉迪沃斯托克—维克托·巴甫洛维奇·洛马金：春天形势严峻——没有秋翻地，干旱。牛奶供应滞后。民众情绪不错。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A.K. 乔尔内同志：今年春天好于去年。播种正常，作物发芽率很好。民众情绪不错。”“1973年8月12日。罗斯托夫—邦达连科称粮食产量可达2.7亿普特，谈话后他承诺提高到3亿普特。”“1976年5月7日。库尔斯克—古德科夫：庄稼长势良好，雨水充足，越冬作物长势很好。”“1977年6月23日。阿尔泰边疆区—尼古拉·费多罗维奇·阿克肖诺夫：情况有所好转，部分地区已经降雨。正在储备干草和其他牲口饲料。”“1977年8月29日。与柯西金通话，主要讨论粮食采购问题。然后我布置任务——收购粮食，但需要增加汽车和轮胎，否则我们无法把甜菜运出去。”等等。

晚年时候，勃列日涅夫越来越难以胜任亲自“电话管理”和监督农业的工作，但“到处打电话”的传统保留下来。大约从1981年5月末起，勃列日涅夫的秘书们开始定期向各州委会、区委会和共和国委员会打电话，询问预计收成。例如，5月31日，总书记秘书 A. 贝奇科夫分别致电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奥廖尔、布良斯克、卡卢加、图拉、坦波夫、哈尔科夫、罗斯托夫、梁赞、科斯特罗姆、乌里扬诺夫斯克、弗拉基米尔、伏尔加格勒、扎波罗热、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询问这些地区越冬作物长势和近期降水情况。贝奇科夫写道：

① РГАНИ. ф. 80. оп. 1. л. 261. л. 15-16.

② РГАНИ. ф. 89. оп. 1. л. 385. л. 76.

③ Запись от 13-14 октября 1964 г.

“往别墅打电话，向列昂尼德·伊里奇^①汇报通话结果。”^②1981年6月3日，按照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委托，另一位秘书H.苏霍多利斯基打电话给库尔斯克、图拉、奥廖尔、科斯特罗姆、诺夫哥罗德、别尔哥罗德、巴尔瑙尔、奥伦堡、哈尔科夫、坦波夫、卡卢加、利佩茨克、乌里扬诺夫斯克、高尔基和沃罗涅日。秘书们将了解到的信息汇报给勃列日涅夫后，再根据他的指示（将信息）分发到政治局成员手中。6月6日，秘书A.克钦给19个州的行政中心打电话，询问截至当天这些黑土带和非黑土带州的播种和降水情况。第二天是星期日，勃列日涅夫亲自打电话到克里姆林宫接待室，以获得克钦了解的信息。6月10日，“列昂尼德·伊里奇拿走苏霍多利斯基收集的信息，看完后转给契尔年科同志”。秘书们通过早晚邮班定期向扎列奇耶别墅和扎维多沃别墅邮寄天气和播种情况材料。结果，从6月中旬起，苏共州委和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们开始抢着给总书记接待室打电话，汇报谷物长势和天气情况，不再坐等勃列日涅夫秘书的电话。这一方面反映出勃列日涅夫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不肯放权，仍然紧盯着众人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释为勃列日涅夫是在履行“小交易”中自己应承担的义务。甚至在总书记去世前几个月，即1982年6月，我们仍能看到已经成为传统的日志内容：“库纳耶夫：一切正常……库斯塔奈：一切都好。巴什基尔——沙里科夫：情况特别令人满意，有望达到平均产量。奥伦堡：不会达到平均产量。利佩茨克：一切都好。”^③如此等等。

（五）“民众不明白也不想明白……”

“小交易”政策极大地减轻了苏联民众的生活

负担，但它实际上使苏共领导层陷入绝境。针对勃列日涅夫在1969年12月15日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有评论指出：“推行全面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政策后，苏联领导层突然意识到，民众不明白也不想明白，这项任务对苏联经济有多复杂。”低价食品、工资上涨趋势和普遍的赶超式劳动生产率成为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令党和国家领导层深感忧虑。勃列日涅夫承认：“我经常思考此类问题。毋庸置疑，应该切实满足民众需求，但我也给自己提出问题：这些需求的界限在哪？”^④

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期，苏联公民从来没有像在这一时期那样吃饱穿暖，此前许多对他们而言属于遥不可及的美好生活象征的东西——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手表、家用电器——已经成为寻常物品。可以认为，不断提高苏联人民物质福利的政策，而非建成共产主义是勃列日涅夫时期主要的国家理想。苏联第四位领导人是真正的改革先驱，不论这听起来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正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思想深入人心，共产主义理想退居次要地位，经济占据首位，尽管社会主义经济始终处于短缺状态。政治体制与民众的共适应是勃列日涅夫政策的另一个主要结果：“小交易”使大多数居民到苏联解体前一直停留在苏联体制框架内思考改革。

（责任编辑 李淑华）

① 勃列日涅夫，下同。——译者注

② Записи секретарей приемной Л. И. Брежнева за 1981 г. См.: РГАН. ф. 80. оп. 1. д. 351. л. 1-185.

③ Запись от 29 июня 1982 г.

④ «Наши недостатки, трудности и проблемы...» 2011.